

人民音樂家 冼星海

中國華書店

紀念冼星海同志逝世三週年

— 1948.10.3

人民音樂家洗星海

出版 華中新華書店

印刷 鉛字印刷廠

發行

華中新華書店
及各分支店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通縣一——八〇〇

題詞

念。
今年十月三十日是中國人民音樂家，新音樂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冼星海同志逝世三週年紀念。

三年前的這一天，正當偉大的民族解放抗日戰爭勝利之際，我們都在期待着星海同志的歸國，為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事業貢獻出更光輝的創造，全中國人民——尤其是全解放區的人民，都在冀望着聽到和唱到星海同志的更其雄偉健壯的歌聲；然而，驚心的噩耗傳來，我們親愛的星海同志却病歿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蘇聯。

星海同志自一九二五年從法國回到祖國以後，即全心全意全力地投入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十餘年來，他日以繼夜地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而『向着全世界勞動的人民，發出戰鬥的警號！』在蘇聯緊張的戰鬥環境中，他奮不顧身的工作；為反對德國法西斯蒂企圖摧毀世界無產者的祖國而發出了他響亮的聲音——第二交響樂。

星海同志遺留給我們的作品，僅就發表的有：短歌一百五十首上下，大型聲樂作品六部（包括歌劇一部）。此外尚有合唱一部，未完成的歌劇一部，交響樂兩部及到蘇聯後的一些作品。其它還有許多未發表的手稿及遺失了的曲稿都未統計在內。他的創作的業績在中國新音樂運動史上以至中國近代音樂史上都表現了空前的輝煌燦爛，這豐富的創作成果表現了鮮明的人民大眾的立場和鮮活潑的民族氣派，而且在創造新的人民大眾的風格與新的表現形式上，也給我們開闢

了一條大路。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加研究和學習的。這裏，我們選編了一些紀念文字和歌曲，以及星海同志自己寫的「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一文，作爲我們偉大的人民音樂家逝世三週年的紀念。

今天，神聖的人民解放戰爭已將臨全國勝利的局面。「黃河」沒有停止它的怒吼，中國人民的公敵——大漢奸蔣介石及其統治集團的深重罪孽，已被「黃河」的怒濤昭彰於全世界了。讓「黃河」更激烈地咆哮吧！讓我們「戰鬥的警號」吹得更響亮吧！

一九四八年十月

目次

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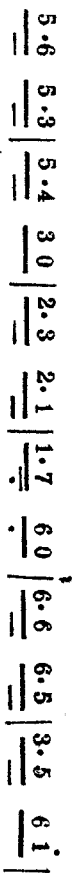
- 路是我們開(歌曲)..... 星海遺作(一)
- 我學習音樂的經過..... 星海遺作(二)
- 創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的經過..... 星海遺作(一八)
- 弔星海..... 郭沫若(二五)
- 哀悼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同志..... 蕭三(二七)
- 悼星海同志..... 呂驥(三〇)
- 哀悼星海同志..... 賀綠汀(三二)
- 懷洗星海..... 馬思聰(三四)
- 悼洗星海先生..... 沙汀(三七)
- 學習星海同志的優良作風..... 向隅(三九)
- 解放區人民熱愛星海同志..... 周巍峙(四一)
- 回憶星海同志..... 馬可(四三)
- 我們常想著的親愛的導師..... 弘魯(四六)

熱情、飽滿、堅定	煥之(四八)
悼星海(詩)	柯仲平(五四)
紀念星海同志(歌)	敬之詞、魏峙曲(五六)
星海悼歌(歌)	力揚詞、蘇明曲(五九)
沈星海同志遺作目錄	(六一)
星海同志在蘇重妻作品介紹	(七〇)
沈星海同志年譜紀略	(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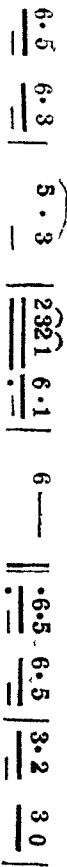
bd 調 $\frac{2}{4}$

路是我們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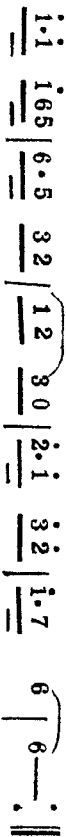
星海遺作



路是 我們 開(哎唷) 樹是 我們 栽(哎唷) 摩天 樓是 我們 親手



造起 來(哎 唷) 造起 來(哎 唷) 好漢 子當 大無 畏



揮着 鐵腕去 創造 新世界 (哎唷) 創造 新世界 (哎 唷)

我學習音樂的經過

××兄：

我到這裏已經一年多了。現在又是春天，每年春天，我總想多寫些東西，今年春天，大概還能更多寫一些吧。我剛剛寫完『三八』婦女歌舞活報，『犧盟大合唱』，又要開手寫『澄陽河』歌劇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大合唱』……。

我住的地方是一條小溪流入一條河的山溝邊。春天冰雪融化了，河水、溪水嚴重地、磅礴地向東奔流。在柳樹枝頭抹着苔綠的包圍裏，禮堂——從前是一個教堂——的雙塔尖插入明秀的天空，引起了異國的回憶，我想起你前次的來信。

你問起我的創作經驗，我覺得我還談不上什麼經驗，因為我現在也還在學習中。但爲了答謝你給我的鼓勵，只好不避厚顏，將學習的經過亂七八糟的寫下來。這樣的東西，怕於你沒有什麼益處吧！

一 在巴黎

我曾在國內學音樂有好些年。在廣州嶺南大學教音樂的時候，感到國內學音樂的環境不方便，很想辦法去。同時，我漸想把我的音樂技巧學的很好，成功爲一個國際的音樂家。正在考慮

之際，漢巧得馬思聰先生的幫忙，介紹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奧別多非爾（Paul Oberdoerfer）給我，於是我下了很大的決心，不顧自己底窮困，在一九二九年離開祖國到巴黎去。到了巴黎，找到餐館跑堂的工作後，就開始跟這位世界名提琴師學提琴。奧別多非爾先生，過去教馬先生時，每月收二百佛郎（當時約合華幣十元左右）。教我的時候，因打聽出我是個做工的，就不收學費。接着我又找到路愛日·加隆先生，跟他學「和聲學」、「對位學」、「賦加曲」（「Fugue」——學作曲的要經過的課程）。加隆先生，是「巴黎音樂院」的名教授，收學費每月亦要二百佛郎。但他知道我的窮困後，也不收我的學費。我又跟「國民學派」「士奇藍·港多薩姆」學校（是一個唱歌學校。係巴黎最有名的音樂院之一，與「巴黎音樂院」齊名。也是專注重天才。與「巴黎音樂院」不同之處，是她不限制年齡，「巴黎音樂院」則二十歲上下才有資格入學。此外，她除了注意技巧外，對音樂理論比「巴黎音樂院」更注意。）的作曲教授丹地學作曲。他算是我第一個教作曲的教師。以後，我又跟里昂古特先生學作曲。同時跟拉卑先生學指揮。這些日子裏，我還未入「巴黎音樂院」，生活窮困極了，常常妨礙學習。

我常常在失業與飢餓中，而且求救無門。在找到了職業時，學習的時間却又太少……我曾經做過各種各樣的下役，像餐館跑堂、理髮店雜役、做過西崽（Boy），做過看守電話的傭人和其他各種被人看作下賤的跑腿。在繁重瑣屑的工作裏，只能在忙裏抽出一點時間來學習提琴、看書、練習寫曲。但是時間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課的時間無論如何要想法去上課外，有時在晚上能夠在廚房裏學習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時一早五點鐘起來，直做到晚上十二點鐘。有一次，因為白天上課弄的很累，回來又一直做到晚上九點鐘，最後一次端菜上樓時，因為暈眩連人帶菜都摔倒，挨了一頓罵之後，第二天就被開除了。我很不願把我是一個工讀生的底細告訴我的同事們，甚至連老闆也不告訴。因此，同事對我很不好，有些還忌刻我。在我要去上課的那天故意多找工

作給我做。還打罵我。因此，我常會同人打架，有一個同事是東北人，他一看見我學鋼琴，總是拿事給我作。譬如說壁上有一絲塵，要我拿抹布等等。但我對他很好，常常給他寫信回家（東北），他終於感動了，把我特別看待，給我衣服穿等等。可是我還不敢訴他我入學的事。

我失過幾十次業，餓飯，找不到住處，一切困難問題都遇到過。有幾次又冷又餓，實在支持不住，在街上歇下來了。我那時想大概要餓死了。幸而總能僥倖碰到些救助的人。這些人是些外國的流浪者（有些是沒落貴族，有些是白俄），大概他們知道我能彈奏提琴，所以常在什麼宴會裏請我彈奏，每次給二百佛郎，有時多的給一千佛郎。有對白俄夫婦，他們已淪落到做苦工，他們已知道了勞動者的苦楚，他們竟把得到很微薄的工資幫助我——請我吃飯。我就是這樣朝朝暮暮的過活，談不上什麼安定。有過好幾天，餓得快死，沒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館大餐館中去拉奏討錢。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錢，回到寓所不覺痛哭起來，把錢扔到地下，但又不捨得拾起來。門外房東在敲門要房金，只好把討到的錢給他；否則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險（其實，如不是爲了學習，倒是個活路）。有一次討錢的時候，一個有錢的中國留學生把我的碟子揮掉，掌我的頰，說我丟中國人的醜！我當時不能反抗，含着淚悲憤得說不出話來。——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很不喜歡我，他們有錢，有些領了很大一筆津貼，但却不借給我一文。有時，我並不是爲了借錢去找他們，他們也把門閉上。我只看到在門口擺着兩隻到四隻擦亮的皮鞋（男的女的）。

我忍受生活的折騰，對於學音樂，雖不灰心，但有時也感到迷惘和不樂。幸而教師們幫助我、鼓勵我。在開音樂會演奏名曲時，多送我票。奧別多非爾先生在一個名音樂會裏演奏他的提琴獨奏時，不厭我的窮拙，給我坐前排。這些給我的意外的關懷，時時促使我從新提起勇氣；同時也給我擴大了眼界。我的學習自覺有很大的進步。我寫了好多東西，我寫學習應用很複雜的技巧

在困苦的生活的時日，祖國的消息和對祖國的懷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很喜歡看法國國慶節和「貞德節」的大遊行。這兩個節是法國很大的節日，紀念的那天，參加的人非常擁擠。有整齊的步兵、衛隊、坦克隊、飛機隊等。民眾非常熱烈的唱國歌，三色國旗飄揚。我每次都很有感動。在一九三二年，東北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節日，我照例去看遊行。但是那次羣衆愛護他們祖國的狂熱，和法國國歌的悲壯聲，猛烈地打動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難的祖國，和三年來在巴黎受盡的種種辛酸、無助、孤單、悲忿抑鬱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兩眼裏不禁充滿了淚水，回到店裏偷偷地哭起來。在悲痛裏我起了怎樣去挽救祖國危亡的思念。

我那時是個工人，我參加了「國際工會」。工會裏常放映些關於祖國底新聞片，和一些照片。我從上面看到了祖國底大水災，看到了流離失所、飢餓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黃包車（人力車）和其他勞苦工人底生活；看到了國共分裂的大屠殺……這些情形，更加深了我底思念、隱憂、焦急。

我把對於祖國的那些感觸用音樂寫下來，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樂寫下來一樣。我漸漸地不顧內容的技巧（這是「學院派」藝術至上的特點）用來描寫與訴說痛苦的人生和被壓迫的祖國。我不管這高尚不高尚。在初到法國的時候，我有藝術家的所謂「慎重」，我對於一個創作要花一年的功夫來完成，或者一年寫一個東西。像小提琴及鋼琴合奏的「索那大」我就花了八個月的功夫。但以後，就不是這樣了。我寫自以為比較成功的作品「風」的時候，正是生活逼得走頭無路的時候。那時我住一間七層樓上的小房子裏，這間房子底門窗都破了。巴黎底冬天本來比中國冷，那夜又颳大風，我沒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點燈寫作，那知，風猛烈吹進，煤油燈（我安不起電燈）點着了又吹滅。我傷心極了，我打着頭，聽寒風打着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

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湧湧起來。我不能自己，借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以後我又把我對祖國的思念寫了『遊子吟』、『中國古詩』和他的作品。

我想不到『風』那麼地受人歡迎，我底先牛很稱讚它，舊俄（現在已同情蘇聯）底音樂家也是現在世界有名的音樂家普羅珂非葉夫（Paulkoflieve）現在是蘇聯名作曲家，作品中形式主義的傾向很嚴重，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聯共中央關於音樂的決定中，普羅珂非葉夫與肖斯塔可維奇、木斯可夫斯基、謝巴林等同時受到批判。——編者）也很愛它，並且它能在巴黎播音（上面說過的『索那大』也被播音過）和公開演奏。

大概因為作品的關係和別人底介紹，我僥倖得識了『巴黎音樂院』底大作曲家普羅·刁客（Paul Dukax）先生。他是世界三大音樂家之一（印象派），更僥倖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門生。他給我各種援助，送衣服送錢，不斷的鼓勵我，還派他底門生送我樂譜、香煙（我當時不抽煙沒有收下）；並答應准我考『巴黎音樂院』底高級作曲班。在這之前，一個法國底女青年作曲家，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忙，她親自彈奏過我底作品，她鼓勵我不要灰心，教我學唱、學法文。經濟上不時調濟我（她底母親待我也很好），在我考『巴黎音樂院』的時候，她先練習了八個月的鋼琴為我伴奏。

報考的那天，『巴黎音樂院』底門警不讓我進門，因為我底衣服不相稱——我穿了一套袖子長了幾寸的西服——又是個『中國人』。我對門警說：我是來報考高級作曲班的。他不相信，因為中國人考初級班的也很少，而且來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高級班，過去只有馬恩聰先生入過提琴班。這樣就難怪他阻擋我了。正在為難，恰巧普羅·刁客先生從外面來，他攀我底肩一同進去了。

我總算萬幸考入了高級作曲班，考到了個榮譽獎。他們送給我物質的獎品時，問我要什麼，我說要飯票，他們就送了我一束飯票。入學後，我專心作曲兼學指揮，又在國民學派『士奇藍·港多隆姆』學習樂理論，這時，生活上較有辦法了。學校准許我在校內吃飯，刁客先生更常幫助我。不過比起別人來，我窮得多。學習時物質的需求還很難解決，譬如買書就不易。所以我幾次要求政府給公費。照我底成績及資格說來，是應得公費的，但祖國政府對我底幾番請求都沒答應。學校給證明。甚至當時巴黎市長赫里歐也有證明文件都不行。我很失望。我記得有一年，有個要人到巴黎來，找我當翻譯，我要求他想法給我資助德國去學軍樂（那時我還未入『巴黎音樂院』），回來為祖國服務。我的要求沒有達到目的。他那時還是對外宣傳中國需要抗日，我又是要求學軍樂，却還不能答應我的請求；待到我入了『巴黎音樂院』再遙望政府給公費，自更困難了。結果是從始到終一文公費也領不到。我在『巴黎音樂院』的幾年生活，只靠帥長學校的幫助。

一九三五年春，我在作曲班畢了業。刁客先生逝世，我就不能再繼續留在巴黎研究了。另一方面我也想急於回國，把我底力量貢獻給國家。所以臨行時，上面說過的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勸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為不知她底盛意，我向她說謊，說半年後就回到巴黎來。我有許多曲稿，還留在她那裏。另外還有許多書及稿件也關在別處一間小寓所裏，因為沒錢交房租，不能取回來。大概現在還在吧！

一九三五年初夏，我作最後一次歐洲的旅行。幾年來，我把歐洲主要的許多大小國家底名城首都都遊過了。我增長了很多知識。這最後一次到倫敦的旅行，却很不順利。登岸時英政府不准我入境，它看見我底證明文件及窮樣子，以為我是到倫敦找事做的。它不相信我是旅行者。我被扣留了幾個鐘頭，虧得能打電話到公使館，才釋放了。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是歧視的，英國底成見尤深。

二 回到祖國

從倫敦回來之後，我就起程回國了。

在同國的途上，我沒有錢，得友人之助，坐貨船。一路和同國的工人、水手一起生活，非常愉快。工人，我很合得來。其實我自己也算「半個」工人。在巴黎的近郊，我參加過華工底一個很大的晚會。那時歐陽予倩先生也在，我爲了人們奏提琴，我自己也很快樂。這次回國，雖然享不到人們坐郵船那種福氣。但說說笑笑，坦白真摯的生活，也很好。我們行船，經過許多地方。到非洲時，我還上岸去觀光了一趟。

船到香港，喜悅和憤怒一齊起來了。喜的是一別七年的祖國已經在望，憤怒的是香港底那種建築一律是殖民地式，連顏色也一樣。以前未到歐洲不知道此種恥辱，到過了巴黎看過殖民地展覽會，和親眼看過非洲及安南等地的建築後，這種憤怒是不能不起來了。待到香港印度巡捕故意和我們爲難的時候，更加憤恨。以後到了上海，除了在香港所得到的不快外，還加上碼頭工人破爛衣裝的刺激，比起在巴黎影片裏看到的更要使我難過。

我在上海北四川路旁的一個亭子間裏會見了一別七年的母親。她比從前蒼老了許多。七年來，只靠自己養活自己，讓我去追求我的理想，她那種自我犧牲的母性，使我覺得難受得很。我那時想，我要好好的服侍她，不讓她再受苦了。

但是我找不到職業，我還要吃母親底飯。以後，搬了家，招收了幾個學提琴的學生，算是暫時解決了生活問題。

那華秋，江北大水災，我應了「南國社」友人之邀到南京。要去看大水災。後因故不能成行

在南京時，跟過友人到歌女處聽唱。他們一邊和歌女周旋。我一邊在旁記下她們底曲調和情緒。我想使我底音樂創作充滿着各種被壓迫同胞底呼聲。這樣我才能把音樂為被壓迫的祖國服務。回上海後，我底第一個回國的作品寫成了，那是影片「時勢英雄」底插曲「運動會歌」。「一二九」運動起來，上海底大、中學裏有些學生和我相識，他們寒假到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要我寫個歌。我寫了個「我要抵抗」，這是我第一個救亡歌曲（現在原稿都失掉了）。接着又寫了「戰歌」、「救亡進行曲」。這兩個歌和「運動會歌」都收入百代公司唱片。因為「戰歌」等的唱片銷路迅速，打破了百代公司底其他唱片紀錄，百代公司願意聘請我了。我也滿意這個職業，因為可以大大的收些救亡歌曲。可是這滿意很快就被打消，「戰歌」的唱片及底片被沒收打毀後，百代公司底老闆就不願收救亡唱片了。我在那裏，只是做做配音，做一些生意眼的工作。但這種工作就攔我時候不少，妨礙我底創作和發展。那時，我覺得民族危機很深，我開始着手寫「民族交響樂」（大樂曲），要有很多時間才行。另一方面，百代公司待遇的不平（有些技術很差的薪水比我多八倍）和某些同事以買辦氣的態度來對待我，我也很不快，因此不久我就辭職不幹了。

一九三六年初，上海工部局（上海外人統治租界的政府）底音樂隊，答應我開個音樂會演奏我的作品，但籌得差不多的時候，工部局及樂隊的領袖都不答應。結果開不成了。他們是不願意弱小民族有一樣出頭表現的，何況是他們一向以為「最高尚」的音樂呢。

離開百代公司之後，我又開始了窮困的生活。雖然在百代公司裏每月有一百元的收入，但上海的應酬大，每月都不剩。還好，我還能給影片寫些歌曲，有時一個歌能拿一百多元。我有了錢，除了家用外，就拿些來幫忙窮朋友，尤其是音樂界的。我對於中國底新音樂運動是熱心的，我應了當時的救亡歌曲運動者底要求，義務的給他們那些幹部教作曲、指揮等，我也常常到各界的歌詠會或班裏去教唱。

所以這個時期雖然失望，倒也不寂寞。

不久，新華影片公司要大做生意，又聘請我做樂部門的負責者（但不給我全權）。在這時期裏我寫了不少的曲。如『搬夫曲』、『夜半歌聲』底插曲、『熱血』、『黃河之戀』等；又作了『打犂歌』、『小孤女』、『瀟湘夜雨』、『青年進行曲』等等。這些歌曲寫作的時候，已經是救國運動受到阻礙的時候，所以多是彎彎曲曲的說出心裏話。我這時作曲只能寄怨號於悲鳴。但是，新華影片公司底老闆漸漸投機了。他專門要收古裝片，迎合低級趣味。他們要弄『新毛毛雨』。我是不能答應的，他就慢慢擺出老闆的面孔要我強作『新毛毛雨』之類。他當我不知道我底曲底價值。他以為一百五十元的月薪就可把我全部的創作力買下來了。但是我是知道我底曲每個可賣出一百多元的。我知道他底算盤只要我一個月給他作三個曲，他就賺我二三百元。對於我，這當然還不在乎，最重要的，我從事音樂事業不是爲了做買賣。所以不久我又辭掉了職務。我甯可窮困，甯可分文不計的爲社會服務。

我仍在上海文化界、話劇界、音樂界裏爲他們配曲、配音、教唱等。我以前會寫個『復活』底插曲：『茫茫西伯利亞』、『莫提起』（在南京演出）。到此時，我又給『太平天國』寫插曲：『炭夫曲』、『打江山』，還有『日出』裏底『打樁歌』。另外寫些『沒有祖國的孩子』，『旱災歌』，『魯迅追悼歌』等等，又爲『大雷雨』全部配音和寫插曲。我不要一個錢和報酬。

我在此時接觸了許多埋頭苦幹的人士，他們真心的爲祖國底事業來獻出全部力量。也看見了許多只顧出風頭的人物，也看見表面熱心實際壓迫人的人物。我不斷地寫作，我得到許多同胞底幫助、鼓勵和批評，也遭受過檢查、限制和排斥。我以前所想的祖國那麼天真簡單，現在沒有了。我有時也苦悶，但愉快的時候多。

我喜歡接近學生，尤其喜歡接近工人、農民，我在工人底歌詠隊裏教歌。也到大場鄉下去教

歌。他們對我底作品表示歡迎，我從他們底喜怒哀樂裏，尤其勞動的呼喊、抗爭裏吸收新的力量到作品裏來。自然我對他們了解還不夠，我底作品也還淺薄，不深入。可是比起在巴黎的作品充實的多。在巴黎的作品，連作風也未確定，只不過是有印象派底作風和帶上中國底風味罷了。而尤其是覺得高興的，是我底作品那時已找到了一條路。吸收被壓迫人們底感情。對於如何我底力量挽救祖國危亡的問題，是有把握了。我底作品已前進了一步。我底寫作和實踐初步的聯系起來了。

三 從上海到武漢

「八一三」抗戰爆發，我參加了洪深兄領導的上海演劇第二大隊，離開上海到內地宣傳，經過了許多地方。最不能忘的是一九三七年冬天，我們到湖北漢冶萍煤鐵廠。我和他們談話，我下到煤礦井的底層，觀察工人底上作生活。他們全身脫的精光，天一亮就下去，晚上才出井。整天看不見太陽，井底空氣惡劣，燈光不亮，我在那礦廠裏參觀了好幾天，教工人們大會唱，工人們很願意和我接近。我在礦廠裏作了「起重匠」這個曲。

以後我們到了武漢。

在武漢，演戲第二大隊底歌詠工作，成了推動武漢歌詠工作的中心，我每天工作十幾個鐘頭。武漢底歌詠隊到處建立，一直擴大到工廠、商店、農村。又與張曙兄合作，開過許多歌詠大會，舉行過歌詠大遊行，遊行的時候，商店一起合唱起來。

在武漢，這時期的工作最興奮，我作了「保衛武漢」、「五一工人歌」、「新中國」、「祖國的孩子們」、「游擊軍」、「華北農民歌」、「當兵歌」、「我們為隊伍向前走」等。只是對於歌曲的漫無標準的檢查，監視救亡工作，甚至連「救亡」二字都不准用等等現象，很叫人不快。